

彭 雨 孙霞珍 管纪奋 执笔

西南
新华
日报
简史



新华日报》报史编委会 编著
重庆出版社

296

敬祝第一个国庆节要：
恢复工业，保卫工业；
清匪反霸，进行减租
运动，实行土改，使百分
之八十人口的农民摆脱
封建桎梏而获得生产，
收复台湾，解放西藏，建
立国防，保卫国家建设
与世界和平，反对美帝
武装侵略。

刘伯承题

刘伯承同志题词（原载1950年10月1日《新华日报》，据刘伯承同志的手迹制版）

西南軍區司令員

賀龍將軍昨午抵重慶

劉鄧首長率黨政軍各機關

負責同志親往途中歡迎

【本報訊】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同志與王德舟同志、周士蒼同志等，由成都乘汽車於昨日（四日）午十二時抵重慶。上午九時許，劉司令員鄧政委鄧副政委鄧軍長及各機關負責同志乘車親往成渝公路山洞林園迎候。十一時許，劉司令員鄧副政委鄧軍長與賀龍同志在車站見面，賀龍同志即由林園乘車至市內寓所休息。今日各機關負責同志，將舉行盛大歡迎晚會。



員令司賀 員令司鄧

1949年11月、12月，劉伯承、鄧小平將軍率二野部隊由湘西入川，賀龍將軍率一野部隊由陝西入川，共同完成了解放四川，解放西南的任務。1950年2月4日，賀龍自成都乘汽車到重慶，劉伯承、鄧小平親往市郊迎接。因為2月5日《新華日報》刊載的會師消息及照片。（當時報社印刷條件很差，照片不夠清晰，但反映了三位首長的風采）



向西南进军途中：小憩

左起：吴远帆（芝青同志的警卫员）、李蔚然、常芝青、张惊秋、李半黎（毛伯浩供稿）



1953年《新华日报》部分领导同志合影。左起：前排李少言、纪希晨、伍陵、中间高丽生、张友、袁毓明、章彬，后排刘希、张文华、毛伯浩。（章彬同志提供）



《新华日报》大楼 (阎玉供稿)



新华日报第二次通讯干事会议全体合影二二

《新华日报》第二次通讯干事会议全体合影。前排右一常芝青，二排右一张友、右三李蔚然。(李乃如同志提供)



报社到川北老根据地访问的同志合影。自左至右
前排 张友、熊景平、李淑方、吕荣芝、罗弘道。
后排 卢云、黄玄之、沈志钧、陈岳峰。

(沈志钧同志提供)



1953年“七一”，《新华日报》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大会后留影。
(孙霞珍同志提供)



1951年6月29日，西南《新华日报》邀请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西南分团及总团直属分团的代表们举行座谈会。图为赴朝慰问团与编辑部同志合影。第一排：左三纪希晨、左六常芝青、左七赵国有、左八钟林、左九王一知（东北抗日时代金日成将军的老战友）、右二毛伯浩、右三邱璜峰。

（纪希晨同志提供）



《新华日报》摄影训练班结业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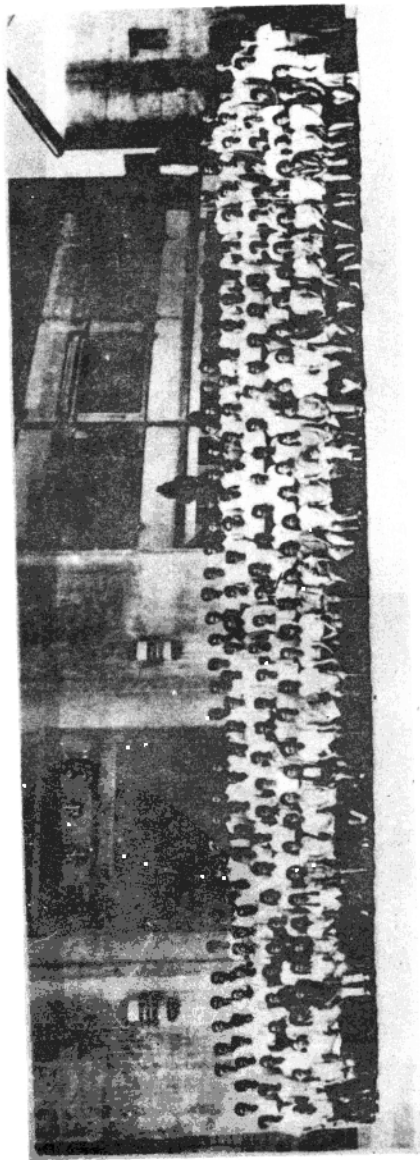
（沈志钧同志提供）



《新华日报》团组织的一次活动。1953年1月3日，团员和青年工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
(余义达供稿)



年轻的排字工人篮球队 1951年4月合影。



《新华日报》终刊时全体同志合影。

(李乃如供稿)



1990年4月召开纪念西南《新华日报》40周年报史座谈会期间，廖井丹同志和到会的其他同志在《重庆日报》与原《新华日报》社职工座谈后合影留念。



1993年10月12日，原《新华日报》在渝同志举行报史座谈会。图为会后合影。

西南《新华日报》报史编委会

(按姓氏笔划为序)

主任委员 廖井丹
副主任委员 纪希晨 伍陵 许川
雷勃
委 员 毛伯浩 文宗武(《重庆日报》副总编辑)
沈世鸣 李少言 范荣康
姚志能(《四川日报》总编辑) 彭雨

代序言

继承和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

——在纪念西南《新华日报》40周年报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廖井丹

今天召开纪念西南《新华日报》四十周年报史座谈会，来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是很有必要的。

当时，《新华日报》的领导班子是由《晋绥日报》、华东的同志以及其他方面的同志组成的，《晋绥日报》那一部分，我比较熟一点，其他的同志是初次见面。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曾讲过，他对《新华日报》和《新华日报》的班子是比较满意的。我办过几张报纸，一般都住在报社，但西南《新华日报》我没住在报社，对报社同志接触比较少。那时，刚进城，事情比较多，对《新华日报》除了言论这一部分以外，可以说我基本上没怎么管，并很快就交给常芝青同志了。我在《新华日报》时间不长，总算有一点渊源吧。

《新华日报》是西南局的机关报，当然是张党报，党报有个性质问题，党的报纸应当怎样办好？根据小平同志在西南地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我看是不是可以归纳成这样三点：

一、报纸的指导思想应当从党的角度，从领导的角度看问题

过去有句老话，“党的报纸是党的喉舌”。既然是党的喉舌，就不能有两种声音，不能党委是一种调子，报纸又是一种

调子。这本来是一个老问题,但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有时不一定真正解决得好。拿现在的语言来说,叫“舆论导向”。你往哪里导?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去导?当然,我们办报的同志,本身并不是在领导岗位上,但是你的发言,你的讲话,你的文章,必须跟领导的指导思想相同,不应当有杂音。按照列宁的讲法,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组织者。办报的同志只是集体中的一个成员,这个成员必须根据集体来行动,不能离开这个集体,自行其是。《新华日报》在这一条上总的说还是好的。小平同志在讲话中也说是进步。这个进步是因为有西南局领导。党的领导之所以重要,不在于我们党办报的前期,而在于我们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和后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我们党的报纸,多少年的传统,突然中断,或者是另起炉灶?从根本上说,就是否定党的传统,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统。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借改革开放的名义,来摆脱党的领导。老的问题在新的情况下,不一定能走上正确的轨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部分同志,有的办党报的时间相当长,为什么相当长的时间在党的培养下,成长、发展,而后又反过来,背离党的传统,走到另一方面上去了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主要是他们对党的传统采取否定的态度,对于我们党过去的有些失误,把它放大来或扩大到各个方面。我们党有失误,这是事实,但失误或者挫折,也是我们党自己来纠正的。有一种论点,认为“人民不会犯错误,党会犯错误”,把党跟人民分开来,把人民和党对立起来。这个论点,不管在历史上,在现在都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次人民运动,或者叫农民起义活动,基本上是失败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先锋队,缺乏由无产阶级先锋队组

成的政党领导。没有这个领导是不行的。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主要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世界上有的地方跟中国的情况差不多，为什么革命不能成功，跟领导有关系。这可以看出，党的领导是任何时候不能离开的。拿个人的经历来讲，也是如此。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本事，离开了党的领导，干不出什么事情来。如果走在反面，那只能作坏事。我们党的历史，北伐战争后，十多万党员，一下子散了，个别共产党员虽然相信马列主义，但他发挥不出力量来。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与党失去联系，就要想方设法找党。我记得有一次少奇同志在大区宣传部长会议上曾经讲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党的工作归根到底是两项工作：一是宣传，一是组织。没有组织以前靠宣传，宣传马列主义，把相信马列主义的人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又宣传马列主义，进一步组织起来，这样，越滚越大。组织起来，不光是党组织，还要组织军队，组织政府，组织经济，组织各种各样的组织，然后又宣传，反反复复。党报在宣传工作中有它的特殊地位，它的面广，你讲话听的人有限，如在报纸上发表，那就是千千万万的人来看，影响就很大。在党报这个问题上不能离开党，更不能认为我们办报纸的人比党更高明。我们党是在不断犯错误中前进，个人也是这样。犯了错误总结经验，又变成我们新的财富。一个人如果没有经验，这个党员恐怕不是很好的党员。毛主席讲过，栽过跟斗的同志有个好处，比如掉进井里，下次走到那个地方，他就谨慎小心了，没有摔过跟斗的同志，莽莽撞撞，还要可能摔下去。我不是提倡犯错误，老实说这很难免。有的报纸批判“难免论”，那些同志可能是接触实际太少。共产党人搞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怎么有可能不犯错误，没有这种事情。党报在

党的方针、政策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应当从实际中了解情况，向党委反映。

二、关于联系人民群众的问题

报纸本来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个纽带，而且这种联系是很广泛的。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报纸应当很好地联系群众，深入实际，了解实际。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一个报社工作，那个地方搞土改，我下去搞了一两个月，发现实在“左”。一个贫农的女儿刚嫁给一个地主没几天，就把她关起来，当时天气比较冷，把她的衣服也剥了。我们回来向党委作了反映，党委提醒我们，对“左”的东西，报纸要注意。当时罗荣桓同志讲：干部“左”了，容易纠正，群众“左”了，搞成一个声势，就不容易纠正。并叫我回去后，召集编辑记者开个会，让他们把下边的情况都摆一摆。那时，报纸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得到上级的指示后，报纸上没有再继续大规模地宣传那些“左”的东西。报纸的工作，联系群众是基础。当然，对群众也要分析，不能不分三七二十一。去年有的人看见学生出来示威，就赶快支持，好像那就是人民群众。去年有不少人随大流，看见别人搞得挺起劲，也跟着搞。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应当在这些问题上比较冷静一些。列宁讲，群众要分阶级，阶级中有先进、中间、落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说服团结中间状态的，教育落后状态的。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认为都是群众，代表了群众，反正出来一个人也叫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你说他少也不少。这一点我们要记住毛主席所讲的，有时候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这并不是否定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就有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要把群众意见中合理的、先进的部分提取出来、集中起来，摒弃那些落后的

部分，这才叫群众路线，不能说跟着跑就叫群众路线。当然，这些话讲起来比较容易，做起来就有些困难。

报纸如果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当地的群众，是不行的。全国有全国的报纸，西南地区有西南地区的报纸，西南地区的报纸必须反映西南地区的实际，西南地区人民的愿望。领导和实际和群众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三、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

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联系实际，为人民群众服务，必然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讲，《新华日报》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有进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不能离开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不能含含糊糊。去年有些报纸就在那里含含糊糊。含含糊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赞成错误的东西，一种是没有看清楚。过去在革命战争时期，不能含含糊糊，在解放初期，也是那样，不能含含糊糊，比如清匪反霸、恢复经济、土地改革、思想改造，在哪一个问题上都不能含糊。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针，在联系群众方面，好的就应当表扬，差的就应当批评帮助，错的就应当教育。如果报纸把这个武器丢掉了，作用就要大大地降低。现在，中央提出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并不是不要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批评与自我批评决不是居高临下，瞎指挥，把报纸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去指责。我就看过那种报道。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有党性原则，要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我们代表的是人民群众最大最长远的利益，有时候长远利益与当前的利益不一定完全一致。但一定要跟人民群众讲清楚，这是从长远利益上来着眼。比如治理整顿，有的有点意见，对当前利益有点损害，但不搞对长远利益损害更大。我们共产党不是

拿些眼前利益来糊弄群众，必须从最大最根本的长远利益着眼。不然，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共产党人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长远目标。总的来讲，在办报问题上，总结吸取一下过去的经验，是很必要的。《新华日报》没有丢掉解放区办报的优良传统，还是在传统上工作。那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没有市场。我们这个国家，改革开放坚决要搞，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是决不能忘记的。我们国家搞到现在这样，是来之不易的，不能把自己好的东西说得一钱不值。我从来对民族虚无主义是反对的。中华民族能够生存发展到现在，不是一个简单事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中国未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要补课。我说这是不懂历史。中国并不是没有实验过资本主义。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他的伟大在于看见了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缺点，所以他搞民生主义。我们党搞民主革命阶段的时间不算短，从“五四”运动算起已有70年，当然比资本主义国家短。中国经过二十几年激烈的战争，牺牲两千万以上的人，不能说没有触动封建社会，没有触动三座大山。当然我们的民主还要发展，但是只能按照我们的国情来办事，要想找一个现成的模式，那是不可能的。

再说一下，我过去对《新华日报》管得不多，主要是我对这个班子比较放心。当然，不是说没有缺点错误，比如“三反”“五反”中就有些问题。这次同志们在一起，把这些问题回忆一下，目的在于吸取经验，更好地前进。我祝愿这个会圆满成功。

(1990年4月24日)